

章太炎先生与《庄子》研究

黄 华 珍

On Zhang Taiyan and His Research on "Zhuangzi"

Outline

Zhang Taiyan is not just a prominent democratic revolutionary and thinker but also a great master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in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He first read about Zhuangzi when he was very young. By the time he was in his twenties, he had begun to "peruse the whole book, grasp its true essence and delve into its significance". While living in exile in Japan, Zhang Taiyan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Zhuangzi and gave lectures about the philosopher to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besides participating in politics. During this period, he wrote *An Exposition of Zhuangzi's Philosophy, Commentaries and Annotations on Entity* as well as many other book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in *Commentaries and Annotations on Entity*, the author looks at Zhuangz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estern philosophy and Buddhist philosophy in an attempt to set forth his own philosophical views.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the times and his own problems, the philosophical system Zhang Taiyan set up was not without its shortcomings. In spite of this, the approach he adopted to the study of Zhuangzi was original and enlightening and therefore he should be given a positive and realistic evaluation from a critical and inheritable angle.

Key words

Zhang Taiyan, Zhuangzi, entity, Buddhist

引 言

《庄子》既是道家的主要经典，又是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一部著名古籍。由于内容博大精深，表现手法奇特，历来对它的理解多有歧义。

章太炎（1869 - 1936年）和《庄子》一书早有接触，二十余岁时，“诵其文辞，理其训诂，求其义旨”⁽¹⁾，后来又不断钻研精进，为后世留下了一些研《庄》论著。和一般学者不同，章太炎不仅是一位多有建树的国学大师，还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革命家。他的特殊身分无疑又给他的论著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政治色彩。在流亡日本期间，他为什么要致力于研究并为留日青年学生讲授《庄子》？他以佛解《庄》，探讨《庄子》思想和唯识宗思想的共通点的行动，是否真是“可怜无益费精神，有似黄金掷虚牝”⁽²⁾？从整体来看，他对《庄子》内容的研究和《庄子》思想的运用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这是本稿关心并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 章太炎先生研《庄》概况

章太炎的研《庄》代表论著，首推《庄子解故》和《齐物论释》⁽³⁾。

根据《自述学术次第》⁽⁴⁾等资料可知，章太炎自幼浏览《老》《庄》，这当是他接触《庄子》等道家思想的开始。后来，在他的许多论著和讲演中，曾反复提及《庄子》。例如，大约作于光绪十七、十八（1891、1892）年的《膏兰室札记》⁽⁵⁾，就涉及了《庄子》的《则阳》、《让王》、《大宗师》、《养生主》、《徐无鬼》、《让王》、《天下》、《至乐》等篇的内容。

《庄子解故》曾连载于《国粹学报》第五年（宣统元年己酉，1909）自第五一迄六一期⁽⁶⁾。胡道静先生在《庄子解故》附记⁽⁷⁾中写道：「余得章先生手自批校日本明善堂铅排本《评注庄子》上册一帙，起《逍遥游》，迄《天运》篇，简端墨书，核与《国粹学报》所载先生《庄子解故》一同，因知《学报》文稿，实自校本移写而小有改定。校本书衣有先生题记，文亦略同《解故》自叙，独于具名之前，有纪岁月“著雍涪滩宰相之月”八字，始知先生预备为诸子讲授《庄子》而发正旧诂，乃在戊申岁七月，公元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也。」由此可知，《庄子解故》的撰写与在东京讲授《庄子》同时进行，所以《庄子解故》也可以说是「与诸生讲习旧文」的产物。它的部分内容与早期撰写的《膏兰室札记》有关，两者解释虽有所不同，从治学的连续性考虑，当是章太炎长期研《庄》，不断思索，“旦夕比度，遂有所得”⁽⁸⁾的结果。

至于《齐物论释》，原发表于宣统二年（1910）《国粹学报》。后来又加以补充和修改，编辑整理成定本。民国元年（1912）由频伽精舍校刊出版了单行本。《齐物论释》写道：「夫以论摄论，即论非齐。所以者何？能总摄故。方谓之齐，已与齐反，所以者何？遭不齐故。是故《寓言篇》云：“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大般若经》四百七十八云：“若于是处，都无有性，亦无无性，亦不可说为平等性，如是乃名法平等性。当知法平等性既不可说，亦不可知。除平等性，无法可得。离一切法，无平等性。”又云：“非一切法平等性中有戏论，若离戏论，乃可名为法平等性。”此义正合《寓言》之旨。」仅此一段，以佛解庄，溶佛庄于一体的意图便一目了然。章太炎曾自称该文“千六百年未有等匹”⁽⁹⁾，“可谓一字千金”⁽¹⁰⁾，可见他对这篇论著十分满足和自负。

二 《庄子解故》和《齐物论释》内容检讨

《庄子解故》和《齐物论释》，撰写时间一前一后。前者在训诂，在探索《庄子》字句的含意。后者则是在引进西方哲学思想的同时，力图证明庄学和佛学的一致性。下面让我们以《齐物论释》为重点，考察一下这两部作品的具体内容。

1. 《庄子解故》

《庄子解故》题记写道：「《庄子》三十三篇，旧有《经典释文》，故世人讨治者寡。……余念《庄子》疑义甚众，会与诸生讲习旧文，即以己意发正百数十事，亦或杂采诸家，音义大氏备矣。若夫九流繁会，各于其党，命世哲人，莫若庄氏，消摇任万物之各适，齐物得彼是之环枢，以视孔墨，犹尘垢也；……微言幼眇，别为述义，非《解故》所具也。」

书中引用《诗经》、《周礼》、《说文解字》、《经典释文》等古籍的内容，以及郭象、成玄英、戴震、王念孙、俞樾、孙诒让等人的有关注释极多，有独特之处，至今还常为研《庄》人员所称引。例如，对《齐物论》原文：「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中的“隐”字，章太炎解曰：「隐，借为“愆”。《说文》：“愆，所依据也。”“隐几”亦即“据几”。此言道何所依据而有真伪，言何所依据而有是非。答言真伪依据小成而起，是非依据荣华而起。明真伪，是非惟从势利为准，本无正则也。」

至于存在的问题，正如朱季海先生所说：「先生为此，肇端讲习，一时乘兴，多凭记忆，退而疏

录，不更检书，先后参差，非无出入。」⁽¹¹⁾

2. 《齐物论释》

《庄子·齐物论》是反映《庄子》哲学思想最重要的篇目之一，内容宏富，历来受到普遍的重视。庄子认为，世界万物包括人的品行和感情，看起来千差万别，归根到底却是齐一的；既然万物齐一，那么言论也应该是齐一的，没有什么是非和不同。庄子并不是没有看到客观事物存在的差别、对立，但是出于万物一体的观点，认为这一切都是统一的、浑然一体的，而且都在向其对立的一面不断转化，因而又是没有区别的。篇文中既有宇宙观方面的讨论，也有涉及到认识论方面的各种议论；既有充满辩证的观点，也有形而上学的论调。章太炎选择该篇加以注释和论述，当也是出于哲学意义上的考虑。他在释文中纳入康德“批判哲学”和华严，法相哲学解释《庄子》，力图借此表述自己的哲学观点。全文思路广阔，自由奔放，广征博引，论议纷繁。国学经典，佛学经典，西方哲学以及自然科学用语频频出现。

《齐物论释》篇题写道：「《齐物》者，一往平等之谈，详其实义，非独等视有情，无所优劣。盖“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乃合《齐物》之义。」这是章太炎对庄子齐物思想的总的理解。他在这里所说的“一往平等”的实际意义，并非只是等视众生，无所优劣，而是佛教经典《大乘起信论》所说的“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他强调应从佛法所谓人与活物平等的意义来理解“齐物”，又根据《庄子》“齐是非”“齐物我”的观点，解释人与万物的“平等”关系，主张“必须破此我法二执，泯灭一切是非区别”。

《齐物论释》全文除序、篇题之外，还按《庄子·齐物论》的内容分为七章，章或节下面为释文。

第一章，「南郭子綦隐机而坐……因是已。」（第一章又分为以下六节：第一节「南郭子綦隐几而坐……其所由以生乎！」第二节「非彼无我……而人亦有不芒者乎？」第三节「夫随其成心而师之……万物一马也。」第四节「可乎可……是之谓两行。」第五节「古之人……此之谓以明。」第六节「今且有言于此……因是已。」）

章太炎写道：「“齐物”本以观察名相，会之一心。名相所依，则人我法我为其大地，是故先说“丧我”，而后“名相”可空。子綦坐忘，自言“丧我”，若依定境，则《毗婆沙论》八十四云：瑜伽师初解脱地名空无边处。从此定出，必起相似空想现前，手觅自身。最极为灭尽定，意根中断，我执不行，若依真证，则双断人我法我也。」（大意：“齐物”本是靠观察名相（名称和现象），会之于一心。名相所依，人我法我是根底，所以先说“丧我”，然后“名相”就可以空了。子綦坐忘，自己说“丧我”。如果按（安心一处而不昏沉沉，了了分明而无杂念的）定境，则如《毗婆沙论》八十四所说：瑜伽师把初解脱地取名为空无边处，从此定而出，必定引起相似空想出现在眼前，亲自寻觅自身。最终极为（六识心作用泯灭的）灭尽定，意根中断，我执不行，若依真证（修行得道），人我法我双方都断绝。）

第二章，「夫道未始有封……此之谓葆光。」

章太炎写道：「详夫物量无穷，天地未足以定至大之域，是固庄生所明。且圣人者，智周万方，形充八极，故能不行而知，不见而名，岂遽不知六合以外哉。……佛典多论世界形相，荒忽难知……」（大意：审察物量无穷，天地不足以决定至大之域，这本来是庄周所阐明的。圣人智慧遍万方，形体布满八极，故能不行而知，不见而名，怎么能不知道六合以外的事情呢？……佛典也多论述世界形相，荒忽难知……）

第三章，「故昔者尧问于舜曰……而况德之进乎日者乎？」

章太炎写道：「原夫《齐物》之用，将以内存寂照，外利有情……然志存兼并者，外辞蚕食之名，而方寄言高义。若云使彼野人获与文化，斯则文野不齐之见，为桀跖之蒿矢明矣。……或言《齐物》之用廓然多涂，今独以蓬艾为言，何邪？答曰：文野之见尤不易除，夫灭国者，假是为名，此是樗枿、穷奇之志尔。」（大意：推究《齐物》的功用，是以内存寂照（内圣），外利有情（外王）……然而心存兼并别人的人，对外回避蚕食之名，却借口说是高尚合乎正义。如果说让野人获得文化，很清楚那就是文明和野蛮不齐的看法，是桀王、盗跖的蒿矢。……有人说《齐物》的用处廓然多涂，现在却独以蓬艾（国微君卑）为言，这是为什么呢？回答是，对文明和野蛮的看法最不容易消除，消灭别人国家的人，借此为名，这只是古代恶人樗枿、穷奇的行径。）

第四章，「啗缺问乎王倪曰……而况利害之端乎。」

章太炎写道：「物所同是，为众同分所发触受想思。子所不知，谓触受想思别境界何缘而发，又若识及根尘，既由迷一法界而成，迷本无恒，何故数限于六，不能有七。如第一问，已证圆成实性，而见依他起性者，当能知之。如第二问，虽释迦亦不能知也。」（大意：物所同是即所谓众同分（唯识宗二十四不相应行之一），指的是众生相似的触受想思（五遍行的四个心所）。子所不知，是说触受想思的众同分是由分别的境界（对象）因某个缘由而产生，而且如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为六识）及根（眼、耳、鼻、舌、身、意为六根）、尘（色、声、香、味、触、法为六尘），既然由迷于一法界（意识的对象）而成，那么迷本无恒，为什么数字只限于六，不能有七？如第一问（指“子知物之所同是乎？”），已参悟圆成实性，而见依他起性者，当能知道。如第二问（指“子知子之所不知邪？”），即便是释迦也不能知道。）

第五章，「瞿鹊子问乎长梧子曰……故寓诸无竟。」

章太炎写道：「康德之批判哲学，《华严》之事理无碍，事事无碍，乃庄生所笼罩，自非天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尔。则天倪所证，宁独生空，固有法空，即彼我执法执，亦不离是。真妄一原，假实相荡，又非徒以自悟，乃更为悟他之齐斧也。」（大意：康德的批判哲学，《华严》的事理无碍，事事无碍，都是庄周（齐物哲学）所包摄的，倘若他不是天下至精，又怎么能参与至此呢？天倪所证，宁独生空，固有法空，即使我执法执，也不离此。真和妄一个本原，假实互相转移，又非徒以自悟，更是作为悟他的利斧。）

第六章，「罔两问景曰……悉识所以不然！」

章太炎写道：「近世达者，莫若萧宾闾尔，彼说物质常在之律，非实验所能知，惟依先在观念知之。然不悟此先在观念，即是法执，其去庄生之见，侷乎不及远矣。」（大意：近世精明者，没有像萧宾闾尔的了。他说，“物质常在之律，不是实验所能知道的，惟靠先在观念而知。”然而却没有悟及这先在观念就是法执。以此衡量他和庄周看法的距离，还侷乎不及远哩。）

第七章，「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此之谓物化。」

章太炎写道：「详夫寤寐殊流，孰为真妄，本无可知，康德谓以有觉时故知梦妄，此非了义之言。梦云觉云，计其时序，分处有生之半，若云以觉故知梦妄，亦可云以梦故知觉妄。……佛法所说轮回，异生唯是分段，生死不自主故，圣者乃有变易，生死得自主故。如说老聃不知其尽，仲尼以是日徂，斯皆变易生死之类，而庄生亦无异文别择，皆以众所不徵，不容苟且建立，斯其所以为卮言欤。」（大意：审察清醒和睡觉时的不同流露，哪一个真实，哪一个虚妄，本来就无从知道。康德说，“因为醒了所以知道梦的虚妄。”这不是了义（生死涅槃无二无别，即最圆满的义谛）之言。梦云觉云，计其时序，分别处在有生之半，如果说因为醒了所以知道梦的虚妄，那么也可以说因为作了梦所以知道醒的虚妄。……佛法所说的轮回，异生这样分段，是因为生死不自主，圣人才有变易，是因为生死得自主。比如说老聃不知其尽⁽¹²⁾，仲尼以是日徂⁽¹³⁾，这些都是变易生死那一类，然

而庄周也没有选择别的不同字眼，都以为这是众人所不能证明的，也不容苟且建立这种轮回的学说，这是他当作危言来说的原因吧。)

全文内容纷繁，以上所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已能了解其基本面貌。从第一章所说“‘齐物’本以观察名相，会之一心。”一语，可知章太炎是以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来理解和判断“齐物”的。文中出现的佛学经典有《瑜伽师地论》、《大般若经》、《大乘入楞伽经》、《摄大乘论》、《摄论》、《解深密经》、《毗婆沙论》、《涅槃经》、《因明入正理论》、《华严经》、《俱舍论》、《起信论》、《胜鬘经》、《胜论》、《成唯识论》、《十地论》、《十轮经》、《十二门论》、《圆觉》等；涉及的西方哲学家有柏拉图、亚黎史陀德、康德、萧宾闾尔等。反映了章太炎在溶佛庄于一体的同时，积极研究和吸收西方哲学思想的动向，具有在黑暗中寻求光明的时代气息。

三 章太炎先生的研《庄》立场和动机

如前所述，《庄了解故》原是“与诸生讲习旧文”的产物，虽然题记中已经明确地表示了崇庄抑儒的倾向，但并没有展开全面深入的讨论。当时，章太炎还只是站在学者的立场上追求《庄子》字句的原义。到了撰写《齐物论释》，情况趋于复杂，涉及面也比较广。

《齐物论释·序》写道：「昔者，苍姬讫录，世道交丧，姦雄结轨于千里，烝民塗炭于九隅。其惟庄生，览圣知之祸，抗浮云之情，盖齐稷下先生三千余人，孟子、孙卿、慎到、尹文皆在，而庄生不过焉。以为隐居不可以利物，故托抱关之贱；南面不可以止盗，故辞楚相之禄；止足不可以无待，故泯死生之分；兼爱不可以宜众，故建自取之辩；常道不可以致远，故存造微之谈。维纲所寄，其唯《消摇》《齐物》二篇，则非世俗所云自在平等也。体非形器，故自在而无对；理绝明言，故平等而咸适。《齐物》文旨，华妙难知，魏晋以下，解者亦众，既少综覈之用，乃多似象之辞。夫其所以括囊夷、惠，炊累周、召，等臭味于方外，致酸齷于儒史，旷乎未有闻焉。作论者其有忧患乎！远睹万世之后，必有人与人相食者，而今适其会也。」

大意是说，从前，周王朝天命将终，社会动乱，奸雄四起，九州百姓生活涂炭。惟有庄周，看到一般的诸子百家企图以人为的作法治乱的思想会给社会带来祸害，反对去图浮云⁽¹⁴⁾ 似的名利地位，齐稷下⁽¹⁵⁾ 先生约三千多人，孟子、孙卿、慎到、尹文都在，而庄子却不与他们往来。庄子以为隐居不能给人民带来好处，所以当了小小的官吏；以为当了天子那样的统治者也不能维持社会秩序，所以辞退了要他享受高官厚禄当楚相的聘请；以为只追求适可而止⁽¹⁶⁾ 那种个人精神的满足也不能达到“无待”的境界，所以泯灭了死生之分；以为《墨子》那种兼爱说不能使人民的生活安定，所以建立了否定造物主的“咸其自取”⁽¹⁷⁾ 的学说；以为“道可道，非常道”⁽¹⁸⁾ 不能理解“钩深致远”⁽¹⁹⁾ 那种真正不可预测的道理，所以留下极其微妙的言谈。维系其文章主旨的唯有《消摇》《齐物》二篇，那不是世俗所说的自在平等。它的本体不是物质形器，所以自由自在而且超过相对；它的道理超过言语，所以平等并且对谁都适用。《齐物论》的文旨，华丽微妙且难解，魏晋以来，注解的人虽然众多，不过既缺少综合分析，又多似象（含胡虚冗）之辞。《齐物论》既包括⁽²⁰⁾ 了隐士伯夷、柳下惠之意，又自然体现⁽²¹⁾ 了圣人周公、召公之志，把世俗等同于方外，批判⁽²²⁾ 了儒史（道）两家，这是旷古未曾听说过的。作论者心怀忧患⁽²³⁾ 啊！他预见万世之后，必然出现人与人相食⁽²⁴⁾，而现在就是这个时期。

《齐物论释·序》接着写道：「文王明夷，则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则国可知矣。虽无昔人之睿，依于当仁，润色微文，亦何多让，执此大象，遂以臆言。儒墨诸流，既有商榷，大小二乘，犹多取携，夫然，义有相徵，非傅会而然也。往者僧肇、道生，摭内以明外，法藏、澄观，阴盗而阳憎。」

宋世诸儒或云佛典多窃老庄，此固未明华梵殊言之理。至于法藏、澄观，窃取庄义，以说《华严》，其迹白不可掩。白澄观至于宗密，乃复剽剥老、庄，其所引据，多是天师道士之言，而以诬汙前哲，其见于下生、肇远矣。然则拘教者以异门致衅，达观者以同出览玄。且《周髀》、《墨经》，本乎此域，解者犹引大秦之算，何者？一致百虑，则胡越同情，得意忘言，而符契自合。今之所述，类例同兹。《诗》曰：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缀游。咨惟先生，其足以与此哉。章炳麟序。」

大意是说，文王处于昏君在上贤人受难⁽²⁵⁾之世，便知道纣王的结局，仲尼离开故国东奔西跑，便知道鲁国。我章太炎虽然不具备古人那样的聪明才智，也应当仁不让地润色微文，并根据齐物的大道理来陈述自己的想法。在撰写时，儒墨各派的学说，既要斟酌，大乘、小乘佛典，也要多吸取，当然文义要互相征引，不是牵强附会而成。以前僧肇（东晋僧人，三论宗创始人，384—414年）、道生（东晋南朝宋间僧人，禅宗先驱，355—434年）以考察佛典理解老庄，法藏（唐代僧人，华严宗实际创始人，643—712年）、澄观（唐代僧人，华严宗第四祖，738—839年）暗中偷引老庄却公然批判老庄。宋代文人中有说佛典多窃白老庄的，这当然是不了解中国和印度语言特殊的道理所致。至于法藏、澄观，窃取庄义以解释《华严》，这事实是不可掩盖的。白澄观到宗密（唐代僧人，华严宗第五祖，780—841年），又再次剽剥老庄，但是他们所引以为据的，大多都是天师道士之言，以此玷污了先哲，他们的看法水平与道生、僧肇相比差得远了。然而，拘泥于宗教的人以门庭不同而争斗，达观者以同出一源而看得深远。《周髀〔算经〕》、《墨经》，本来出自我国，解释的人却要引大秦（罗马）的算法，这是为什么？如果一致百虑⁽²⁶⁾，那么胡越之情相同，意思沟通忘了语言，符契自然就相合了。现在所讲的，类例与此相同。《诗经·商颂·长发》说：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缀游⁽²⁷⁾。只有先生足以与此相配啊。

在这篇序文中，章太炎以广博的古典知识和饱满的政治热情写下了他撰写《齐物论释》的动机和目的。无疑，他是当代庄子或庄子继承人自命的。古代庄周“心怀忧患”，留下了“微文”，他认为自己应该当仁不让地去“润色”。“文王明夷，则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则国可知矣。”这分明也是在以文王、孔子的事迹自喻。现在，他因反对昏庸的清王朝被捕，出狱后流亡日本。这种境遇不正是和当年的“文王明夷”、“仲尼旅人”相似吗？文中的“兼爱”、“世俗所云自在平等”、“拘教者以异门致衅”等语，都暗含着对西方世界的所谓平等博爱的批评，所以他在努力追求“咸适”的平等。

读了这篇序文，我们能够体会到章太炎“心怀忧患”的心情。在这里，他已经不是在单纯追求《庄子》的原义，而是运用和发挥《庄子》思想，以“齐物”的观念立场，揉合唯识宗思想去观察世界、认识世界，力图追求一种新的、为自己的革命理想服务的哲学思想。

四 章太炎先生的人生

章太炎年幼时从外祖父朱有虔受学经史，青年时期入经学大师俞樾（1821—1907年）门庭，刻苦用功，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1896年底赴上海积极参与维新派活动，任《时务报》撰述，又参与《昌言报》《经世报》宣传活动，因与康有为、梁启超政见不合而分道扬镳。戊戌变法失败，走避台湾，1899年初，手订《馗书》。同年5月前往日本，结识了孙中山先生。8月底离日回国，在上海参加《亚东时报》编撰。在这一时期放弃了改良派立场，力主革命。1903年应蔡元培约请，参与“爱国学社”教学，宣传革命。因发表《驳康有为书》及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而触怒清廷，1903年7月因“苏报案”与邹容一同被捕下狱。1904年被判刑三年，在狱中潜心研读佛学经典。同年冬，与蔡元培等成立光复会。1906年出狱，旋即赴日本，参加同盟会活动，并任革命派机关报《民报》主编，为革命奔走疾呼。1908年8月，《民报》被查禁，居留东京讲学。1910年退出同盟会，重组光

复会。上海光复后任《大共和日报》主编。辛亥革命前后，曾对袁世凯存有幻想，后与袁发生分歧，1913年宋教仁遇刺，遂与袁决裂并遭软禁，袁死后方获自由。1917年复与孙中山合作，参加广州护法军政府，任秘书长。护法运动失败后，到苏州讲学。“五·四”运动中，主张尊孔读经，反对新文化运动。1924年反对国共合作。1931年至1936年去世之前，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一直力主抗战。

总而言之，章太炎的人生波澜壮阔，有功有过。在民族灾难深重，人民要求变革的动荡年代，他曾经为祖国的命运奔走呼号，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和成功作出了应有的努力和贡献。不过，不可讳言，有一段时期，他在客观上也起过消极的作用。鲁迅先生《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²⁸⁾一文，在指出章太炎存在的问题的同时写道：「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垢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人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这是比较公允的评价。

在学术思想方面，章太炎也曾几经变迁。他在《庄了解故》题记中认为，「命世哲人，莫若庄氏……以视孔墨，犹尘垢也」。在《自述学术次第》⁽²⁹⁾中则表示：「余既解《齐物》，于老氏亦能推明。佛法虽高，不应用于政治社会，此则惟待老庄也。儒家比之，邈焉不相逮矣。」在《说新文化与旧文化》⁽³⁰⁾一文中又说：「老、庄虽高妙，究竟不如孔子的有法度可寻，有一定的做法。」在《葑汉微言》中则表示：「文孔老庄，是为域中四圣，冥会华梵，皆大乘菩萨也」。一般认为，章太炎的思想早年属于机械唯物主义，后来逐渐转变为唯心主义。除《齐物论释》外，主要哲学著作还有《国故论衡》、《俱分进化论》、《无神论》、《革命之道德》、《建立宗教论》、《无我论》、《答铁铮》、《五无论》、《答梦庵》、《四惑论》、《葑汉微言》、《葑汉昌言》等。李泽厚先生在《章太炎剖析》⁽³¹⁾一文中，强烈批评文革时把章太炎捧为法家的荒唐作法，并把他的一生分为四个时期（即1894—1900年，1900—1908年，1908—1913年，1913—1936年）加以评述。撰写和发表《齐物论释》的年代相当于第三个时期。李先生写道：「第三时期，实际是过渡，可以《齐物论释》（1910年）为标志，庄周这时被抬为最高的哲学，以佛解庄，溶庄佛於一体。到第四时期，则是以‘以庄证孔’孔庄合一。本来是许给庄周的‘内圣外王’的地位，现在又仍然还给了孔丘。」从整体来看，这一看法不无道理。撰写《齐物论释》时，章太炎确实把庄周思想视为最高哲学了。但是，他有一个突出的前提，那就是要“大小二乘，犹多取携”，溶庄佛於一体。到了第四时期，三转两转，他又转到以儒家为主的立场去了。不过，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完全放弃《庄子》思想，只是变为“孔庄合一”了。所以，高田淳先生认为，所谓第四时期的思想，也只不过是第三时期的延长⁽³²⁾。

至于章太炎和佛学的关系，过去已有不少研究论文。根据《自述学术次第》⁽³³⁾记述：「余少年独治经史、《通典》诸书，旁及当代政书而已。不好宋学，尤无意于释氏。三十岁顷，与宋平子交，平子劝读佛书，始观《涅槃》、《维摩诘》、《起信论》、《华严》、《法华》诸书，渐进玄门，而未有所专精也。遭祸系狱，始专读《瑜伽师地论》及《因明论》、《唯识论》，乃知《瑜伽》为不可加。」《自定年谱》⁽³⁴⁾记述：「羈系逾岁，狱未决，清廷复要各国公使杂治。是年三月……入外人所置狱中。狱吏课以裁缝役作。友人或求纳致书籍，狱吏许之。始余尝观《因明入正理论》，在日本购得《瑜伽师地论》，烦琐未卒读，羈时友人来致；及是，并致金陵所刻《成唯识论》。役毕，晨夜研诵，乃悟大乘法义。」由此可知，章太炎原本对佛学没有兴趣，直到三十岁前后，才在宋平子（宋恕）的劝说下阅读佛书，后来又在外人狱中晨夜研读《成唯识论》等书籍，才悟大乘法义。

章太炎所推崇的唯识宗，是唐代的第一个佛教宗派。它的思想源于古印度大乘佛教的瑜伽行派，因主张“万法唯识”而得名；又因提倡用三性解释诸法实相，也称法相宗。所依经典有《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等六经十一论，代表著作为《成唯识论》。主张外境非有，内识非无的“唯识无境”

理论，把思想认识的转变，看成是由迷而悟，由染而净的修习目的，用①遍计所执性、②依他起性、③圆成实性的所谓三自性说概括其全部学说。师承关系可以上溯到印度的无著、世亲兄弟(约为四、五世纪人)，经陈那、护法、戒贤，再传给了玄奘(600—664年)。由于玄奘及其弟子窥基(632—682年)的努力，终于把唯识宗确立为中国佛教的一个教派。又因玄、窥二人曾长期住在慈恩寺，故亦称为慈恩宗。在唐太宗、唐高宗父子的大力支持下，虽曾盛极一时，可是由于它照搬印度那种极端烦琐的经院教义，最终还是不能适应唐王朝封建盛世经济基础的需要，在窥基逝世之后，便逐渐失去影响，走向衰微了。宋明以来即乏传人，清代更是如此。不过，清末杨文会(1837—1911年)从日本得到大量早已佚失的唯识宗文献，并在南京创办了金陵刻经处，吸引了一些人的兴趣，一时曾有不少知名学者走向唯识宗的大门。上引《自定年谱》中也提到“羁时友人来致；及是，并致金陵所刻《成唯识论》，正和当时兴起的“唯识宗热”情况相合。章太炎认为，「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用的。但今日通行的佛教，也有许多的杂质，与他本教不同，必须设法改良，才可用得。」⁽³⁵⁾很显然，他对佛教寄予希望，可又对世俗佛教不满，才看上了早期形成的、照搬印度佛教的唯识宗教派，意在改良中国佛教。章太炎还认为，「佛教行于中国，宗派十数，独禅宗为盛者，即以自贵其心，不援鬼神，与中国心理相合。……是故推见本原，则以法相为其根核。法相、禅宗，本非异趣，达磨初至，即以《楞伽》传授，惜其后惟学《金刚般若》，而于法相渐疏……」⁽³⁶⁾出狱东渡以后，在忙于《民报》编辑以及政事之余，他仍然潜心研读佛书，并留意西方哲学，这无疑成了他撰写《齐物论释》的重要契机。为了学习和掌握有关佛典，他甚至请教了在东京的印度人士，可见他是不遗余力的。

五 评章太炎先生的《庄子》研究

《庄子》是一部思辨性很强，并具有丰富内涵的古籍。由于种种原因，却常常得不到公正的评价和对待。可是，不管是在它的地位高涨还是地位低下的时候，却始终以自身的文风和魅力吸引着历代的许多文人学士。明代王世贞说过：「今天下求工文章者，无不闾习《庄子》。」⁽³⁷⁾这可以看做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庄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存在。不过，章太炎并不是单纯的“求工文章者”，而是力图借助《庄子》思想来建立自己哲学思想体系的革命家。所以，如何评价章太炎的研《庄》活动以及他对《庄子》思想的运用，与如何认识《庄子》思想密切相关。章太炎热爱中国古典，有时甚至到了偏执的程度。他选择以佛解庄，并不是无的放矢，佛庄两者之间确有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庄子》尚虚无，讲相对，与佛教十分相似。

实际上，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在完成其自身的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必然要同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发生碰撞。它们之间既互相争斗又互相融合，到了后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历史上，以庄解佛、以儒解佛等现象早已存在。随着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儒家和道家等传统思想逐渐渗入到佛教之中，“庄佛一体”、“儒佛一体”，甚至“三教一致论”等论调也随之高涨。后来，这种风气和思想还传到了朝鲜、日本等国。素以以佛解庄著称的南宋林希逸著《庄子虞斋口义》就曾在日本流行于一时，并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那么，探讨庄佛的异同，究竟有没有现实意义？不能说没有。毕竟佛教已在中国传播了两千多年，它已在中国生根发芽，佛教文化已经和中国人的生活习习相关。可是，要溶庄佛于一家，却未免过于勉强。比如，《庄子·齐物论》第七章中的所谓“胡蝶梦”，故事短小精悍，却表现了深奥的内容。历来为文人学士所不断征引，在庄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原文写道：「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

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梦是人所常做的，不足为奇。但是，在庄子笔下，梦却寓意深远。在齐物认识的前提下，庄周和胡蝶虽然有所分别，却又是齐的，是处于平等地位的“物”。究竟是庄周梦见了胡蝶，还是胡蝶梦见了庄周？虚虚实实，朦朦胧胧。他们之间的相互变化，既没有什么痛苦，也不必有什么因果关系。然而，佛教的所谓轮回（又称“流转”、“轮回”和“六道轮回”等），原为古印度波罗门教的主要教义之一，后为佛教所沿袭，再与业报理论相结合，形成了“业报轮回说”。其内容是说一切众生，如果不去求“解脱”，就将永远在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六道（天、人、阿修罗、饿鬼、畜生、地狱）中生死相续，没有止息，犹如车轮，回旋不停。《法华经·方便品》所说：「以诸欲因缘，坠堕三恶道，轮回六趣中，备受诸苦毒。」《心地观经》卷三所说：「有情轮回生六道，犹如车轮无始终。」便是这个意思。从表面看来，它也讲变化，理论基础却是灵魂不灭以及因果报应。如果把“道”的作用问题弃置一边，单纯地把庄周“胡蝶梦”深化理解为生死变化，在这个问题上，庄佛之间是有共通点的，但实际上并不“齐”。在释文中，章太炎引用了《庄子》其他篇章中有关生死的论述，并套用佛学理论加以解释，力图证明“胡蝶梦”表现的“物化”就是佛教的“轮回”，认为“庄生亦无异文别择，皆以众所不徵，不容苟且建立，斯其所以为卮言欤。”

章太炎给留日青年学生讲授《庄子》，并撰写《庄子解故》和《齐物论释》，恰好是在他和孙中山等人发生分歧的时候。他的这些行动究竟意味着什么？过去，很多文人学士往往是在官场失意的时候，才在《庄子》中寻找精神寄托。章太炎并不属于这种情况。如果把他的几个行动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他在这一时期的研《庄》活动是有计划地进行的。可能还是在狱中研读佛典时，他就已构思了溶佛庄于一体的具体计划。所以，当他出狱东渡，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的讲演中即表示，“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后来根据实际的结果，鲁迅先生曾评之为“仅止于高妙的幻想”⁽³⁸⁾，但在当时章太炎是认真的。特别是在1908年8月《民报》被查禁后，他一边讲授《庄子》，一边追求《庄子》原义，整理出版了《庄子解故》，并同时为《庄子》题记中预告“微言幼眇，别为述义”，最后撰写了具有深奥理论内容的《齐物论释》，完成了以佛解庄的计划。

无疑，章太炎的研《庄》活动，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这是和他革命家兼学者的身分相适宜的。他在《论佛法与宗教、哲学以及现实之关系》⁽³⁹⁾的讲演中说：「文明野蛮的见，最不容易消去。无论进化论政治家的话，都钻在这个洞窟子里，就是现在一派无政府党，还看得物质文明，是一件重要的事。何况世界许多野心家。所以一般舆论，不论东洋西洋，没有一个不把文明野蛮的见横在心里。学者著书，还要增长这种意见，以至怀着兽心的强国，有意要并吞弱国，不说贪他的土地，利他的物产，反说那国本来野蛮，我今灭了那国，正是使那国的人民获享文明幸福。这正是尧伐三子的口柄。不晓得文明野蛮的话，本来从心上幻想现来。只就事实上看，什么唤做文明，什么唤做野蛮，也没有一定的界限，而且彼此所见，还有相反之处。所以庄子又说没有正处，没有正味，没有正色。只看人情所安，就是正处、正味、正色。易地而施，却像使海鸟啖大牢，猿猴着礼服，何曾有什么幸福！所以第一要造成舆论，打破文明野蛮的见，使那些怀挟兽心的人，不能借口。任便说我爱杀人，我最贪利，所以要灭人的国，说出本心，到了罢了。文明野蛮的见解，既先打破，那边怀挟兽心的人，到底不得不把本心说出，自然没有人去从他。这是老庄的第一高见。……若专用佛法去应世务，规划总有不周。……唯有把佛与老庄和合，这才是“善权大士”，救时应务的第一良法。」这些论点和前文所引《齐物论释》第三章意旨相同，或许可以说更通俗易懂。在这里，章太炎运用齐物思想，借尧想征伐宗、脍和胥敖三个小国的事例，明确主张国家平等、民族平等。文明和野蛮，究竟有没有一定的界限？章太炎认为，“文明野蛮的话，本来从心上幻想出来”，“没有一定

的界限”。他泯灭这一界限的目的是为了要“使那些怀挟兽心的人，不能借口”，为了强调平等，反对侵略。在我们看来，文明和野蛮的界限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说没有。问题是这个界限不应由怀有“兽心”的人去决定。如果有人以此为借口要去灭了别人的国家，那更是万万不能允许的。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虎视眈眈，企图瓜分中国。这是章太炎联系当时的现实世界所发出的正义的声音。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立场一直到他离开人世也没有改变，具体表现就是力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综观章太炎的研《庄》活动和论著，我们看不出他是在《庄子》中寻找消极的因素。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以及章太炎自身存在的问题，更由于他建立起来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性质，他的思想虽能影响于一时，却不可能持久，也不足以救中国。如前文已述，他的一些主张虽然正确，在理论上却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不过，问题归问题，他的探索却体现了当时中国人向往社会革命和进步的求索精神。笔者想特别强调的是，章太炎研究《庄子》以及运用《庄子》思想的态度并不消极。历史上，苏东坡（1036—1101年）也是一位喜佛好老庄的著名人物，他曾经说过：“晋以老庄亡，梁以佛亡。”⁽⁴⁰⁾，而章太炎却要援引《庄子》思想并揉合佛教唯识宗思想来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这在当时是多么富有新意的构想！章苏两人，相去年代甚远，一位在清，一位在宋；他们都是文人兼政治家，一位是力图变革社会的革命家，一位是在王安石变法中失意的官僚；他们都热爱自己的祖国，一位在结束封建王朝的斗争中奔走呼号，作出积极贡献，一位在反复遭贬的逆境中自强不息，赞美江山如画；他们都喜佛好老庄，一位讲“齐物”，积极援引庄、佛思想入世，一位任“逍遥”，在政治思想上辟道、辟佛。他们之间既有可比也有不可比之处，活跃于清末民国初的章太炎，不仅研读了大量的中国古典，还广泛涉猎了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这种揉合古今中外学术于一身的时代条件，是生活于九百多年前的大文豪苏东坡所不能与之相比的。侯外庐先生曾盛赞章太炎“在近代他是第一个博学深思的人。”⁽⁴¹⁾ 尽管时代不同，章、苏两人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巨大的足迹。值得令人深思的是，从结果来看，他们最终都没能摆脱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影响。辛亥革命以后，章太炎逐渐由进步转入保守，由批孔转为尊孔，这样一来便和一向以崇儒为主的苏东坡⁽⁴²⁾“殊途同归”了。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思想影响的巨大威力，同时又可感受到《庄子》思想的广阔内涵。

章太炎所处的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动荡的年代。他和许多立志改变中国现状的先进知识分子们一样，积极参与了在黑暗中摸索救国救民的方案和进程，《齐物论释》便是他长年思索的结晶之一。虽然他建立起来的哲学体系脆弱而无力，但他以齐物思想为观念背景，企图揉合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思想的尝试和实践，是值得肯定的。崔大华先生曾指出：“章太炎思想具有极广博的内容，对举凡中国、印度、古代希腊和近代欧洲最主要哲学派别或人物的思想都有所评述、称引和吸收。他认为“《齐物》一篇，内以疏观万物，持阅众甫，破名相之封执，等酸咸于一味；外以治国保民，不立中德，论有正负无异门之衅，人无愚智尽一曲之用，所谓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宰者也”（《荀汉微言》）。可见章太炎思想的广博和创新，正是由于他从庄子思想中求索到了一种广阔的、具有容摄力的观念背景或理论立场——齐物论。”⁽⁴³⁾ 这是站在历史的、客观的、宽容的角度对章太炎运用《庄子》思想的肯定。

结 束 语

《庄子》是一部闪烁着古代哲人思想智慧的古籍，两千多年来，不管人们投之于热烈的还是冷淡的眼光，它都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并持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正是由于它的存在，不仅大大

地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容，也给人们带来了许多值得探索的课题。章太炎的探索和实践说明，《庄子》“齐物”思想确实具有广阔的包摄能力，取其合理的、积极的因素去为现实的社会服务是完全可能的。可是，如果仅仅是以“会之于一心”去领会“齐物”，去观察世界、解释世界，就必然会脱离客观实际。

通过考察，我们已经基本弄清章太炎研究《庄子》的来龙去脉。他的研究富于新意，给人予启迪。《齐物论释》篇尾中写道：「庄子所著三十三篇，自昔未曾科判，轮材之士见其一隅，党伐之言依以弹射。今者寻绎微旨，阡陌始通，宝藏无尽，以诒后生也。」可见，章太炎对《庄子》内容的思考和认识也是逐步深入的。他的两篇研《庄》代表作，《庄了解故》重在训诂，《齐物论释》重在发挥哲学思想。两者形式不同，作用有异，同样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从批判和继承的观点来看，均应给予积极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注：

- (1) 参见《章氏丛书·续编》(浙江图书馆校刊，民国六年—二十二年)所收《国故论衡·原学》。
- (2) 参见《章太炎全集》(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所收《齐物论释定本校点后记》。
- (3) 参见前出2《章太炎全集》(六)。
- (4) 参见《章太炎学术年谱》(姚奠中、董国炎，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8月)210—217页所收《自述学术次第》。
- (5) 参见《章太炎全集》(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2月)所收《蒿兰室札记》。
- (6) 参见前出2《章太炎全集》(六)所收《庄了解故点记》。
- (7) 参见前出2《章太炎全集》(六)。
- (8) 参见前出1《章氏丛书·续编》所收《荀汉微言》。
- (9) 参见《章太炎生平与学术白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155页所收《章太炎书札·与龚未生书》。
- (10) 参见前出4《自述学术次第》。
- (11) 参见前出6《庄了解故点记》。
- (12) 参见《庄子·养生主》。
- (13) 参见《庄子·田子方》。
- (14) 参见《论语·述而》：“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 (15) 参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 (16) 原文：“止足”，参见《老子》第四十四章：“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 (17) 参见《庄子·齐物论》。
- (18) 参见《老子》第一章。
- (19) 参见《周易·系辞传上》：“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
- (20) 原文“括囊”，参见《周易·坤·六四》：“括囊无咎无誉。”
- (21) 原文“炊累”，参见《庄子·在宥篇》：“从容无为而万物炊累焉。”
- (22) 原文“酸醎”，参见《淮南子·齐俗训》：“为刻削者曰致其酸醎而已矣。”
- (23) 参见《周易·系辞下》：“作易者有其忧患乎。”
- (24) 参见《庄子·庚桑楚篇》：“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
- (25) 原文“明夷”，参见《周易·离下坤上》：“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
- (26) 参见《周易·系辞下》：“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
- (27) “缀游”，《诗经》原文作“缀旒”。句谓：接受上天的小法大法，给诸侯作表率 and 典范。
- (28) 参见《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所收《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 (29) 参见前出4《自述学术次第》。
- (30) 参见前出4《章太炎学术年谱》308—310页所收《说新文化与旧文化》。
- (31) 参见《章太炎生平与学术》(章念驰编，三联书店出版，1988年7月)所收李泽厚《章太炎剖析》。

- (32) 参见高田淳《辛亥革命と章炳麟の齊物哲学》(研文出版社, 1984年11月)。
- (33) 参见前出4《白述学术次第》。
- (34) 参见前出9《章太炎生平与学术白述》53—54页所收《白定年谱》。
- (35) 转引自前出4《章太炎学术年谱》97—99页所收《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
- (36) 参见《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年9月)所收《答铁铮》。
- (37) 参见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邵弁庄子标解序》(明末刊本)。
- (38) 参见前出28《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 (39) 参见《章太炎集·杨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12月)所收《论佛法与宗教、哲学以及现实之关系》。
- (40) 参见《苏东坡全集》(据世界书局1936年版影印, 北京市中国书店, 1986年3月)所收《居士集叙》。
- (41) 参见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生活书店, 1947年)。
- (42) 参见前出40《苏东坡全集》所收《庄子祠堂记》以及拙文《浅谈苏轼与〈庄子〉》(《岐阜圣德学园大学外国语学部中国语学科纪要》第4号, 2001年3月)。
- (43) 参见崔大华《庄学研究》(人民出版社, 1997年5月)。

其他参考文献:

- 《藏要》(支那内学院校刊, 民国十八年十月)
- 《中国哲学史简编》(任继愈主编, 人民出版社, 1973年10月)
- 《章太炎政论选集》(汤志钧编, 中华书局, 1977年11月)
- 《章太炎思想研究》(罗德惠、唐文权,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年7月)
- 《章炳麟的哲学思想》(何成轩,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7年1月)
- 《诸子集成》(中华书局, 1990年8月)
- 《中国佛教思想史》(郭朋,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4年12月)
- 《老庄思想》(池田知久, 放送大学教育振兴会, 1996年3月)
- 《日藏宋本庄子音义》(唐·陆德明撰, 黄华珍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年9月)
- 《章太炎学术论著》(刘凌、孔繁荣编校,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年6月)

(本論文は、2001年9月に中国海寧市で行った章太炎・黄侃国際学術討論会に提出し、また口頭で発表したものである。)